

“海洋江南”：海洋史视野下明代江南经济的“向海”特性

曲金良 朱雄¹

【摘要】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与江南地区经济结构的“向海型”亦即“海洋性”变迁是双向互动的历史进程。明代江南地区作为与海洋密切接触的前沿地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海洋性特征愈发凸显，逐渐发展成为“海陆一体”的向海型的“海洋江南”，以其大规模面向全球市场的商品货源的主要、集中产地，在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和早期贸易全球化进程中担当了历史舞台的主角。将海洋史视角引入明代江南社会、经济转型研究，进而提出“海洋江南”这一概念，重新探讨海洋与江南地区的关联性以及海洋在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对于丰富明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拓展江南地域研究的范围，从整体上认知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面貌以及江南地区如何通过“内外联动”与“中西互动”参与构建了早期贸易全球化的过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复原与当代启示意义。

【关键词】海洋江南 海陆一体 海洋贸易 全球化

一、何处是“江南”：不同的视域空间，不同的区域内涵

“江南”研究备受学者青睐，是学界深耕细作、成果迭出的研究领域。从历史学学科视域来看，其研究大多集中于江南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对其成果进行综述也非易事，仅就学者统计的20世纪百年间江南研究论著目录来看，即可用标尺厚度来衡量。¹可以说，近百年来的江南研究具有持久的魅力与吸引力。“江南”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从不同的视域出发，江南地区的区域内涵是不同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都尝试对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进行梳理与界定，如周振鹤、邹逸麟、李伯重、范金民等都对江南的地理空间范围进行过界定和解说。²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划定江南地区地域范围时往往强调区域间的“一致性”或“同质性”，如地理上的完整性、地域认同的不变性、经济上的一体性，或是方言的相似或相同性（即吴语文化区）、民风习俗上的相似性、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同一性，还有江南地区作为国家财赋重心的同一性等。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对江南地域范围选取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相应研究中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也往往能够自圆其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区域史、海洋史、全球史、海洋文化研究的兴起，注重区域互动比较研究，关注明代江南“海洋性”问题的一些研究成果逐渐涌现。但需要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海洋问题的研究往往是被纳入明代海洋政策、海洋贸易整体框架下进行考量的，其研究用意和主要结论也往往都是具体“实证”明代政府的海洋管理政策阻碍了中外之间的海洋贸易发展，而缺乏与明代整体的王朝政策与宏观经济效果的对接评价，遮蔽了明代海洋贸易事实上的繁荣发展与江南地区整体繁荣发展的互动、共生的历史场景。近年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兴起、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明代东南沿海地区与海洋的互动性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专门探讨明代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江、浙、闽、粤）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日益显现。如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一书认为，明清时期浙江海洋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宋元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浙江地区依托“枕江负海”的区位优势，随着明代海洋贸易的兴盛，刺激了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³徐晓望《明清东南海洋经济史研究》认为，明清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五百年来经济变化的动力之源，这一时期海洋经济

¹作者简介：曲金良，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雄，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海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助理。（青岛26610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研究”（12&ZD113）；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度重点项目“中国通史工程《中国海洋史》项目重大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逐渐向内陆地区延伸，内陆经济逐渐向海洋扩展。⁴王日根《经济之域：明清陆海经济发展与制约》认为，“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繁荣、城镇的兴起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可忽视的是实现了陆海经济的一体化”⁵。王国斌也认为，16—19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手工业与贸易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变化的主要方面，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市场体系的形成与成熟；二是海外市场的扩大与海洋贸易的刺激。⁶此外，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论述南北经济文化重心转移时也曾提到江南主要经济作物的变化以及商品经济发展与海洋贸易兴盛的问题，只是尚未充分展开。⁷就已有的明代江南经济史、海洋史研究成果而言，都或多或少注意到了江南地区与海洋的联系，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但有待进一步推进：一是需要对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的整体“向海性”内涵及其发展作出质的判断，由此将陆海一体、“向海”发展的“江南”定性为“海洋江南”；二是将“海洋江南”的地域空间范围，依据其海陆一体、向海发展的区域结构作出重新厘定；三是分析揭示出这种海陆一体、向海发展的经济模式之如何运作运营、互动共生的具体的历史景观面貌。而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明代的海洋贸易何以如此繁盛，何以形成全球性海上贸易，何以几乎全球性、普天下“万帆梯航”齐聚中国，中国成为世界海洋贸易的中心等问题。

二、“海洋江南”：江南区域结构与经济内涵的海洋特性

关于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以及研究者研究视角的不同，导致中外学界的界定各不相同。传统上，学界大多是将江南地域的范围集中在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八府一州”区域的。⁸江南的“八府一州”无疑是江南的核心区域，但若忽视其与内外腹地之间的互动、互补的一体化关系，则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事实上已有学者强调江南不仅是“江南之江南”，更是“中国之江南”，“世界之江南”⁹，并提出了“江南道路”“江南奇迹”等命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跳出从江南内部看江南“内史”的框架，超越狭义的江南一隅，¹⁰突破区域史、地方史的叙事模式，将江南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¹¹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明清江南史不仅是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¹²。海洋视角、海洋因素无疑是重新认识江南内部、重新认识江南与世界的重要窗口。

在我们以今天的某一理论、某一视角界定历史上“江南”地域范围的时候，一定要使其符合历史实际，而不能对历史事实加以“置换”。回顾明清时期相关文献对“江南”地域空间的所指，可以发现，事实上明代的“江南”并非如今人理解的“狭义”，而是“广义”的。除了南直隶所属州县之外，官方文献也多将江西、福建、湖广等地纳入“江南”，以“江南某地”称之。如明武宗即位诏中言及蠲免、暂停各处瓷器烧造时，就曾直接将江西饶州府称作“江南饶州府”¹³。明人王士性撰于万历年间的《广志绎》将全国划分为“两都”“江北四省”“江南诸省”“西南诸省”几个部分，其中“江南诸省”包括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大部分地区。¹⁴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官修《江南通志》将江南的范围划定为十六府八州，范围大致也包括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大部分地区。¹⁵可见明清时期的江南是“大江南”的概念，江南地区是包括“江南诸省”的，这也是本文探讨“海洋江南”的主要“腹地”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也提“大江南”的概念，将今天浙江、江西、上海以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都称之为江南，这可以说是比较符合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区域范围的。明人观念中“江南”的整体性完整地体现在江南地区以山、海、河、湖泊构成的“山海生态系统”之中，“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邱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¹⁶。将这些地区划入江南的地域范畴，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区地处长江以南，而是更为主要地基于这些地区在政府管理、人文、经济等层面存在“一体性”。这种经济的一体性既体现在“大江南”内部之间的市场流通、循环上，更体现在其自明代开始有了统一的“向海性”。“一体性”内涵着“互补性”，共同型塑了明代江南经济的整体“向海性”。江南地区就是以平原、山地、海洋、湖泊紧密联通一体的地域文明整合体，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海洋交通网络与中国沿海地区和海外世界发生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正是因为海洋因素将江南地区与其腹地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有徽商、扬州盐商、闽商、粤商以及江西从事景德镇瓷器贸易的商人遍布海内外，共同促进了明代江南地区外向型、向海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明代江南地区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江南”。“海洋江南”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江南“八府一州”“枕江负海”，有“海陆之饶”，是“海陆一体”的江南地区的中心地带。江南中心地区特别是环太湖流域，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是十分富庶之地。这一中心地区东邻浩瀚广阔、通达海外的海洋，北倚横贯中国东西的水上干道长江，西接广袤的内陆经济腹地，经济互动、互补关联密切。江南地区“海陆一体”的优势在明清以来的地方志中不断被提起：松江“雄襟大海，险扼三江，引闽越之梯航，控江淮之关键”¹⁶。嘉兴府为浙西大府，“旁接三江，大海环其东南，震泽汇其西北”¹⁷。常州府“北控长江，东连海道，川泽沃衍，物产阜繁”¹⁶。苏州府“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旁连湖海，外控江淮”¹⁸，“擅江湖之利，兼海陆之饶，转输供亿，天下资其财力，地形四达，水陆交通浮江达淮，倚湖控海”¹⁹。松江府“所属八邑半濒于海，海盐蜃蛤之饶民赖其利”¹⁹。杭州府“湖山映带，水陆之会，以船楫为车马”¹⁸。镇江府是“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¹⁸。明清以来大量地方志、史地类政书中对于“江南地区”形胜，描述最多的词即为“负海”“枕江”“海陆之饶”“江海之利”等等。所谓的“负海”，言背靠大海，是战国、秦汉时期以来人们指说滨海地区的习惯性用语。如《史记》张仪列传言“齐，负海之国也”²⁰。可见明清以来人们对于江南地区的“海陆一体”“海陆互补”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这种“海陆一体”便利的内外交通条件、广阔的经济腹地、丰富的商品，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地区向海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其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江南地区“海陆一体”互动发展日益明显。江南内部之间的交流互补是为了服务于海洋贸易这一更大的国际市场。江南地区内部之间市场体系发展之所以更为成熟，是因为海洋贸易的巨额利润刺激，外向型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自发地调节了江南内部的生产结构，以更好地服务于江南地区整体的向海型经济发展。可以说明代“海洋江南”的形成，是在前代已有历史发展基础上的内在自发的结果，也是明代前期国家大航海广泛联通东西方、明中后期西方人泛海东来促发形成了全球海洋贸易网络、链条的外力拉动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又加速了其作为全球贸易中心之重心的形成，因而也加速了全球海洋贸易的繁盛。

诚然，区域的地域范围与该地区有联系的空间（比如港口与腹地的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但区域范围的界定是相对开放的，不像行政区划有明显的界限。将海洋史、全球史的视角引入明代江南经济转型研究当中，进而提出“海洋江南”的概念，不是用来否定已有研究中对江南区域范围的界定，而是通过研究视角的转换、视域的扩展，对已有研究范式作出调整，一方面探讨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江南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是如何关联一体、双向互动、同构共生的；一方面透过江南这一代表性区域，可见明代沿海与内陆、中国与世界相互联系的整体历史进程。无疑，已有研究需要这样的补充、拓展和深化。

三、明代江南经济向海性“海陆一体化”的历史基础与海洋贸易的发展繁荣

（一）明代江南海洋贸易发展繁荣的历史基础

我国海洋贸易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开辟了从山东半岛渡黄海、渤海往朝鲜半岛至日本列岛的海上交通航线，汉代开辟的徐闻、合浦海上通道使我国与东南亚、印度洋区域建立起了密切联系，“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逐渐形成。唐宋元时期的海洋贸易、文化交流、政治互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时期，海洋贸易管理体制，沿海港口的发展都已经比较成熟，明代海洋贸易正是在继承前代海洋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突破性发展繁荣的。

自唐代开始，我国出现了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两宋时期更是江南地区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江南地区已经形成全国的财赋中心。这种经济地位是建立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两宋时期的环太湖流域是我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有着“天下粮仓”的美誉，当时广泛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不过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显然还处于外延增长的阶段，即主要依赖于增加耕地面积和普遍采用稻麦两熟制的形式。江南经济主要依靠的是全部土地开发和耕作制度的合理化，江南经济的繁荣主要依靠的是农业收入，经济性作物的种植与经营尚未占到足够的比重。明代，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相较于宋元时期，其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以经济作物为主，生丝、丝绸和棉布的商品性生产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江南地区特别是苏松杭嘉湖地区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绸、棉布生产中心，产品远销海内外。

“吴丝衣天下，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²¹。万历年间流传

的“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说，是当时生动的写照。此时的江南经济不再仅仅靠田亩收入，而是以副业、手工业生产甚至商业经营所得来衡量，商业性种植、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所得成了农家经济普遍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其比重日益上升。²²

自两宋以来江南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为明代海洋贸易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突出地体现在：一是出口商品的供给地转移到了这一地区，无论是宋元时期还是明代，江南地区都成为海洋贸易商品的主要输出地，这一趋势在明代更为定型；二是海洋贸易的兴盛，愈发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性经济的发展，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下，江南地区的经济腹地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外向型商品经济结构得以确立；三是江南地区海洋贸易的发展促使东南沿海地区海港城市与专业性市镇大量兴起。明代海洋贸易的兴盛与江南地区经济结构变迁、转型是双向互动、同构的历史进程。

（二）明代江南地区海陆一体的海内外交通贸易体系发展成熟

两宋以前中国沿海主要海港的分布，南有广州，北有登州。东南沿海广州以北地区主要有明州、泉州和扬州。到宋元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沿海港口更多兴起。据《元史·食货志》列出设置市舶司的主要商港有七处，广州以北的泉州、温州、庆元（宁波）、澈浦、上海、杭州，都在这一地区。由此辐射出去的海上贸易航线直达东亚朝鲜和日本，东南亚、印度洋、地中海周边各国。明代，这一地区的沿海港口与内陆经济腹地的一体化型塑更为明显，主导性口岸、辅助性口岸、补充性口岸（特别是沿海走私港口、岛屿）和前沿腹地、核心腹地、内陆腹地密切结合，构成了完整的市场网络结构与对外贸易体系。表面上看，江南地区海洋贸易的主要地域空间分布于滨海的前沿地带，这一带不仅分布着众多的港口，而且对外贸易、交往也异常活跃。但沿海州县、滨海地区仅仅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区域，广大的江南内陆地区才是支撑海洋贸易的核心腹地。各口岸的开发活动——无论是规模庞大的货物贸易，还是异常活跃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依托沿海地区的同时，更主要是以江南腹地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为基础的。²³随着江南沿海地区与海洋贸易的日益兴盛，外向型的商品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腹地日益向中部、长江以北地区延伸，进而形成了广阔的附属腹地。沿海省份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省内流动与省际流动十分频繁。福建、江西盛产茶叶、果品、烟草等经济作物，这些经济作物纷纷流入江南市场，江南市场上所产丝绸、棉布也纷纷回流至这些地区。“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即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²⁴由此可见其海陆经济的一体性、互补性，不存在纯粹的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人为割裂海洋与内陆的互补联系，其实是无法正确地认知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现象的。

明代与唐宋元时期海洋贸易发展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进入明中后期以后，东南沿海地区与世界的海洋互联互动具有了近代面向全球市场的特征。其互联互动的频度与广度都非唐宋元时期可比，其市场的流动性、互补性更为成熟，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更为明显。江南诸省之间通过陆运、水运、近海海运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内部贸易市场体系，“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²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代漕运体系更为依赖大运河，使得大运河的维护、利用较前代更为有效，运河长期畅通，南北货物交流十分便利，发挥了巨大的市场联结功能。“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金之酒，皆以地得名”²⁶。江南地区在便利的水陆条件下，手工业专业市场、城市综合市场与原料交易集散地等市场得到了充分发展，通过水陆交通网络，江南地区与中国中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市场紧密联结在了一起。如江西上饶铅山县的河口镇，位于锦江与铅山河合流处，据成书于万历年间的《铅书》记载：“河口之盛由来久矣。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淮、扬。舟楫夜泊，绕岸灯辉，市井晨炊，沿江雾布。……其货来自四方者，东南福建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浙江之湖丝、绫绸……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湖广孝感布、杭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²⁶。仅仅江西一个小县的一个小镇就汇聚了全国各地如此之多的商品，可见当时广义的江南地区市场网络的发达。以江南地区为核心向周边经济腹地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强，不但有力支撑了江南地区海洋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江南地区“海陆经济一体化”的成型。

（三）江南“海陆一体化”格局下海洋贸易与经济转型的双向互动

1. 海洋贸易与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

入明以后,海洋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刺激了江南地区及其腹地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大量经济性作物得以广泛种植,开始形成了广泛的农业商品产区。入明以后,宋朝就有的“苏湖熟,天下足”的农业发展模式开始式微,水稻生产独占鳌头的主导地位被动摇。²⁷江南地区大多地方出现了税粮和食粮依靠外地余买的现象。太仓州“岁资外余以给二运”²⁸,嘉定县“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²⁹。成化、弘治以后,国内外市场对湖丝的需求日益增大,又进一步刺激了该地蚕桑生产规模的扩大。湖州府乌程,农民大量种桑,“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³⁰。湖州“田中所入,与蚕桑各具半年之资”³¹,“(湖州)蚕月,夫妇不共榻,贫富彻夜搬箔摊桑”³²。湖丝的大量生产、外销使得湖州地区经济十分发达,“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有两秋也”³³。嘉兴府崇德等县“田收仅支八个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给,唯蚕是赖,故蚕务最重”³⁴。到万历时期,嘉兴府已经“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饲蚕法多学之吴兴”³⁵。苏州地区丝织业发展更为迅速,据《吴江县志》记载,洪武二年,吴江境内植桑仅有18032株,到宣德七年,增植到44746株,到了明末,“丝棉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见殆无旷土,春夏之间,绿荫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³⁶。崇祯时,“蚕桑乃湖民衣食之本”,已取代水稻,在小农经济中具有主导地位。除了种桑之外,棉花、茶叶、烟草、水果等经济作物也大量种植。松江府成为棉花的主要种植区,“今沿海高乡多植之”³⁷。太仓州“地宜稻者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郊原四望,遍地皆棉”³⁸。棉花种植也成为了松江地区农民生活的主要来源,“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³⁹。有了丰富、充足的蚕丝和棉花供给,苏州等地的丝织业、棉纺织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满足着海内外的市场需求。福建也是同样,沿海居民为了满足海外市场对蔗糖的需求,纷纷种植甘蔗,“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居民磨以煮糖,贩海售焉。”⁴⁰海洋贸易带来的巨大商业利润成为了江南地区外向型经济作物种植的原始推动力,刺激了沿海地区农业商品化生产的转型。

2. 海洋贸易与江南专业型港口市镇的繁荣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特点,最明显的就是商品化和城镇化。商品化必然带来城镇化,而城镇化又推动和促进商品化。⁴¹明代海洋贸易的发展不仅刺激了江南地区经济性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商品化生产,也催生出了一大批专业性市镇与港口城市,这些专业性市镇一般以生产某一类商品而著称,如丝织业中心、棉纺织业中心。太湖流域是传统的桑蚕产区,号称“湖丝遍天下”,太湖周边因此也兴起了一大批丝、绸业市镇,如苏州府吴江县的震泽镇、湖州府乌程县的南浔镇、嘉兴府的乌青镇、石门镇等等;棉纺织业则主要集中于松江府、太仓州、嘉定和常熟部分地区,其著名者有朱泾镇、南翔镇、周庄镇等等。港口城市是人类海洋活动的集中发生地,它们主要服务于海洋贸易,是海上通商贸易的集聚区和商品集散地。明代江南地区联通海洋贸易的向海性发展催生了沿海地区一大批港口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在这些港口城市、专业市镇中,活跃着来自各地的商人,其中最活跃的为苏松、徽州、宁绍、闽越、江淮等地的商人。大量的市镇沟通了杭嘉湖地区与外地、与农村腹地的联系,也沟通了本地之间镇与镇、农户与农户、镇与农村之间的联系。⁴²

3. 明代官私海洋贸易的兴盛

江南地区一端紧密联结海外市场,东南沿海各类海港、岛屿,通过江南地区与其经济腹地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商品与海外市场密切联系,共同创造了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图景。明代海洋贸易历来为学界所误解,认为是中国海洋贸易史上的转折朝代,经历的是我国海洋贸易由盛转衰、从海洋上逐渐退缩、走向封闭的时期。对明代的海疆政策也是多加诟病,认为阻碍了江南沿海地区私人海洋贸易的发展,不利于中国走向世界,等等。事实上对于明代的海洋贸易需要有一个重新认识。明朝海禁政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闭关锁国”或禁止海外贸易,所谓的“海禁”,是指根据海疆安全情况,在特定时间内禁止私人私造二桅以上的大船私自“出洋”贸易,而并非“片板不准下海”。查阅明实录等相关史料,也并未发现朱元璋说过这样的话。⁴³所谓的“片板不许下海”,是后人在追忆明朝海禁时所使用的概括语,这一点明人早已指出:“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糴于邻者也。严其保甲,令民沿海运糴,则广浙有无相通,而福民不患于无食矣”⁴⁴。也就是说“海禁”政策只是为了防倭,而不限制沿海地区的渔民采捕、沿海地区的货物流通。整个明代,海洋贸易与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就是历

史的明证。

四、明代海洋贸易制度的突破与“海洋江南”在早期“贸易全球化”中的角色

（一）明代海洋贸易制度的突破与早期“贸易全球化”的到来

“贸易全球化”，指的是世界各地的产品普遍具有了面向全球市场的商品性质，商品流通中全球各大区域之间、各国之间贸易交换的范围、规模、程度都具有了普遍性的拓展与提升，具有了大范围、大规模、高强度的性质和特征。其“全球化”之“化”的程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早期的“贸易全球化”出现在明代中后期，奠基于明代前期以“郑和下西洋”为主要标志的中国政治文化性大航海，至明代中后期西方的经济贸易性大航海兴起，与中国的大航海实现了时间的相继与空间的对接，导致早期“贸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明代前期的海洋贸易主要是以“朝贡贸易”为主，洪武至宣德年间，特别是永乐年间，朝廷推行“锐意通四夷”的政策，郑和“七下西洋”，引发东西方“梯山航海，万国来朝”，一个庞大的跨越东海—南海—印度洋的大区域国际政治—文化—贸易网络由此形成。就海洋贸易而言，主导权牢牢掌控在明朝政府手中，在“天下一体”“四海一家”的政治构建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⁴²成化、弘治以后，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来，国际市场与江南地区有着双向的强大吸引力，明朝的“朝贡贸易”制度被突破，沿海地区私人海洋贸易大量兴起。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成宏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舶贸易海外者”，“滨海大姓私造舰，岁出诸番市易”⁴³。私人海上贸易或曰走私贸易，并不起源于明代，只是自明代中叶开始最盛，这是与早期的世界市场即贸易全球化的出现相辅相成的。⁴⁴沿海地区“地濒大海，民物庶富，番舶往来，私交易者众”⁴⁵。万历年间有人曾感慨：“今之通番者，十倍于昔矣”⁴⁶。没有明朝海洋贸易制度即朝贡贸易制度的被突破，就不会形成这种局面。

（二）江南地区在早期“贸易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

在早期“贸易全球化”的兴起中，江南地区为海洋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输出商品和巨大的输入市场。明代江南地区的海洋贸易是整个明代海洋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海洋贸易中占有重要的比重，而江南地区是海洋贸易商品的主要产地，是海内外商品的主要集散地。

随着西方商人大规模的航海东来，进一步拓展了江南商品流通的海外市场的高密度空间。江南地区之间庞大的贸易网络体系，将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通过车马、舟船、手挑、肩扛等方式聚集到海岸线上的各个港口，然后再装上随着季风而来的船只驶往海外各地。尤其是正德以后，西方航海贸易商人的势力纷纷向东方扩展，尤其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继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他们以满刺加和吕宋为根据地，形成了中国商品全球市场的海外转输中心。徐光启曾有这样的记载：“……西洋番舶者，市我湖丝诸物，走诸国贸易。若吕宋者，其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悉转市吕宋诸国矣”⁴⁷。日本“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瓷。”⁴⁷葡萄牙人自嘉靖三十六年登陆澳门后，迅即以澳门为中转站，大力从事欧洲、中国、日本三者之间的“三角贸易”——他们装上银元从欧洲出发，用银元换取印尼的香料等奢侈品，到澳门出售这些货物并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货物，然后运到日本销售；在日本换取便宜的日本白银回到澳门，再在澳门用从日本带回来的白银购买广州的欧洲市场上所喜爱的瓷器、丝绸等物。对于这一现象，明人许浮远有过生动的描述：“日本长崎地方，广东象山澳佛郎机番，每年至长崎买卖，装载禁铅，白丝、扣线、红木、金物等货”⁴⁸。隆庆开海，除贩夷之律，准贩东西洋，中外之间的海洋贸易更为繁荣，江南沿海地区俨然已为“天子南库”：“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剗除腥，分市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⁴⁹。

没有江南地区的商品生产即货源供应，就不会有早期的“贸易全球化”。明代江南沿海各海港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生丝、丝织品、棉织品、瓷器、茶叶等，同时谷、布、丝棉、盐、糖、茶、酒等日用消费品在商品中的比重上升，从地方市场走向海内外市场。如日本市场，“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

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⁴⁹江南地区这种海洋贸易的优势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优越的海陆地理位置，所谓“浙水距倭盈盈一水，片帆乘风指日可到”⁵⁰。二是江南地区作为海洋贸易大宗商品如丝绸、棉布、瓷器的主产地，“转贸四方，吴之大资”⁵¹，对外贸易中的丝绸、棉布几乎全是由这一地区生产。三是江南地区成为全国商品的汇聚地与对内对外转输地。江南地区既是全国最大的丝、棉生产地，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转输地，商品买卖十分方便，价格低廉，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徽商、闽商、粤商来此购货，并通过江南地区的港口驶往海外。“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以数十金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余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官军利其贿，惟恐商贩之不通倭；夷利其货，惟恐商船之不至”⁵⁰。16世纪早期至19世纪中期，西方人笔下不时提及“南京布”，即徽州商人、洞庭商人和闽广商人等贩运的产自江南的棉布。⁵²“今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之惠、潮，瓊、崖，狙狨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贸易，彼此无间，我既明往，彼亦潜来”⁵²。由此可见以江南地区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在明代中后期的繁盛程度。

国际市场对中国的生丝、瓷器、茶叶等商品需求量巨大。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输入长崎的中国生丝就达127175斤。⁵³李金明对葡萄牙转运日本生丝进行研究认为，在1612年经葡萄牙转运到日本的生丝有一千三百公担，每年由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转运到西方的生丝数量为一千五百至二千担，或一百二十至一百六十吨；经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走的丝、绸、缎有几千匹。进口到印度尼西亚的传统数量为一万至二万匹。⁵⁴明代后期出现的这种以菲律宾马尼拉为中转地的中国和日本、欧洲、拉美之间的贸易，是西方航海势力与中国私人航海力量在马尼拉相遇的结果，这种贸易的形式基本上是以中国输出丝绸、瓷器等商品，输入美洲白银为根本特点。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商人便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影响，不失时机地推进了全球性商业贸易，在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市场中，中国的商业贸易居于重要的中心地位。⁵⁵

（三）江南地区以“海陆经济一体化”进入早期“贸易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标志

明代江南地区经济与内陆腹地和海洋的互动一体，实际上意味着江南已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外向市场体系亦即全球贸易体系之中。卷入程度越深，对外的依赖就越强。这种外向型以海为生，以“海陆经济一体化”进入早期“贸易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经济模式最终得以形成。那么这一模式的形成是否有量化的标准可以验证？当然我们无法按照现代方法根据GDP、三产业比值等进行量化，但我们可以根据经济种植与商品输出结构、赋税结构、明代白银流入与货币化几个维度进行大概的衡量。

经济种植与产品加工——商品供应输出，上文已述，这里不赘。就赋税结构而言，可以管窥明代江南经济转型的程度。关于江南地区承受的繁重的赋税，明史有言：“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天下”。明人有过评论：“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⁵⁶。“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60）}。徐光启也指出：“（松江）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泉纆，嘉湖之丝纆，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仰俯给，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61）}。这种“向海”特性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富裕的地区，是国家财赋的中心。

江南地区作为明代财赋主要供输地的地位是一直存在的，但自正德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原来赋税征收实物的“本色”地区部分改征“折色”，以银代实物，白银开始走上了国家货币的舞台。

白银的流入与货币化是衡量明代江南经济“转”而成“型”的一个重要指标。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是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迅速增长时期。据梁方仲估计，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达一亿两以上。^{（62）}为了获得厚利，沿海“其民专驾多橈船只接济蕃货”，“追星逐月，习以为常”^{（63）}。通过海洋贸易，大量产自美洲的白银经中西之间的转运而输入中国。学者通过大量研究测算认为，美洲产量一半以上、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最终通过海洋贸易流入了中国。美洲白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输入中国，一是通过太平洋转输的渠道，二是通过欧洲转输渠道。据万明研究，仅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

拉的白银，1571—1589 年约为 3000 吨，1590—1602 年约为 2010 吨，1603—1636 年约为 2400 吨，1637—1644 年约为 210 吨。自 1571 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到 1644 年明朝灭亡，仅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总计就达 7620 吨。⁽⁶⁴⁾如此多的白银换走了中国多少产品，是可想而知的。对此学界也有不少推算，数字自然惊人。

全球白银产量的大规模流入明朝及其在明朝的货币化，所产生的结果至少有五：一是政府和民间普遍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劳作目的——产出物化的产品和商品的目的，赚钱盈利开始成为主导社会与人生的普遍性目标与过程，整个经济由此变成了商业性经济，整个社会由此变成了崇商性社会，江南地区率先垂范，所谓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茁壮生长，主要先在江南生成。二是由于明朝天下占据世界人口与经济规模的至少三分之一，明朝开始了白银货币的国家化，也就事实上导致了白银货币的国际化，全球自此开始了白银货币的通行，中国愈发成为全球商品“供应”的主要货源地和白银吸纳地。由此而三，由于明朝又偏偏不产白银，“货币”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这就必然导致全球商人纷纷携带白银这种“货币”来华，年复一年将这种“货币”留给明朝，而将明朝生产制造出来的“物美价廉”、如海如山的物产年复一年从明朝“买”走，成为世界各地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或高档消费的奢侈品。于是，中国亿万人日夜劳作的目的变成了赚取“银子”，而与明朝建构了“国际贸易”关系实即直接和间接的“银货交换”关系的世界各地，则在实质上几乎“无偿”“免费”地消费着中国如海如山的物产和“繁荣”的外向经济——“中国生产，世界消费”，这一形象说法所指涉的现代“经济全球化”商品供应与消费关系的中外格局，早在明朝的“贸易全球化”时代即已生成。于是第四，就明朝中国内地的经济实态而言，白银——即“钞票”进来的越多，亦即被“买”走的物产越多，留给自己消费的物产就越少——钱多而物少，物价必然高涨，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必然拉大，官商一体、政府腐败必然呈“制度化”发生，一方面是占人口少数的富商、官宦豪华奢侈并拉动社会浮靡成风，一方面是占人口多数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商业化市场化边缘地区的普通民众普遍贫困，于是造反起义四起、“盗匪”啸然，边患日紧，海患——倭乱难平，社会动荡，政府管制失效，军事败绩日重，最终导致政府倒台，也就成为了历史必然——这就是明代后期至晚期一方面经济发达、贸易兴隆，一方面社会动荡、危机四起直至明朝灭亡的社会实况。第五，必然地，越是“天下多事”“江山不稳”的政府，越是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购买”支撑，因而必然实行日益重赋的政策，中国历代王朝薄徭轻赋、“于民休息”的时代一去不再。而重赋的主要“赋源”显然不在商品经济商业社会的边缘地区，因而也就必然地“锁定”在了“江南”——江南之“天子南库”，也就是这样生成的。

对于以上诸点，学界多未充分重视，这里举例提出，希望引起关注，得到深入研究。向海发展、外向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及其历史条件而言，各有利弊，各有祸福，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留给今人许许多多的应有启示，需要今人作出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思量。当今世界，海洋发展、经济贸易全球化依然被视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国与国际社会也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包括“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江南地区有着“海洋江南”及其在早期贸易全球化进程中担当主角的历史基础、历史智慧与历史教训，在当代条件下如何传承、弘扬好历史智慧，汲取、规避好历史教训，担当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新舞台上的新的主角，以利国利民利天下，无疑是政府、社会、学界的共同使命。

注释：

1 唐力行、陈忠平主编：《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

2 相关研究可参看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邹逸麟《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浙江学刊》2010 年第 2 期；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李伯重《火枪与账簿》，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7 年版；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0 年版；高逸凡、范金民《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安徽史学》2014 年第 4 期；胡克诚：《何处是江南：论明代镇江府“江南”归属性的历史变迁》，《浙江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等等。

3 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 2009 年版。

4 徐晓望：《明清东南海洋经济史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年版。

5 王日根：《经济之域：明清陆海经济发展与制约》，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6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7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8 李伯重认为环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镇江、湖州、江宁（应天）、太仓州无论是在地理空间还是经济与人文社会层面都是一个完整区域空间。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9 刘士林、苏晓静、王晓静等：《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7-87 页。

10 刘志伟：《超越江南一隅：“江南核心性”与全球史视野有机整合》，《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2 期。

11 夏明方：《什么是江南——生态史视域下的江南空间与话语》，《历史研究》2020 年第 2 期。

12(64) 邹振环：《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历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

13 佚名：《皇明诏令》卷十八《即位大赦诏》（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参见高逸凡《明代官方文书中的江南》，《江苏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

14(16) (31) (38) (39) (70)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周振鹤点校，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264、263、266、266、218 页。

15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舆地志》。乾隆《江南通志》所列十六府八州为：江宁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庐州府、凤阳府、颖州府、太仓州、海州、通州、滁州、和州、广德州、六安州、泗州。参见乾隆《江南通志》，程章灿点校，凤凰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8-245 页。

16(17) (19)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二十四《南直隶六·松江府》，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0-271 页。

17(18) 胡宗宪、薛应稷纂修：嘉靖《浙江通志》卷六四《杂志第十一》之二《形势》，嘉靖四十五年（1567 年）刻本。

18(20) (23) (24) 方志远点校：《大明一统志》卷八《苏州府·形胜》、卷之三十八《浙江布政司·杭州府》、卷之十一《中都·镇江府》，巴蜀书社 2018 年版，第 384、1831、1967 页。

19(21) (22) 程章灿点校：乾隆《江南通志》卷一《舆地志》，凤凰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78、181 页。

20(25)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2294 页。

21(26) 唐甄：《潜书》下篇《下·教蚕》，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57 页。

22(27) 范金民：《赋税甲天下：明清江南社会经济探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 页。

23(28)陈国灿：《走向海洋：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24(29)王世懋：《闽部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

25(30)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26(32)笪继良编纂：《铅书》卷一，转引自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65-266页。

27(33)侯元棐：康熙《德清县志》卷四《食货考·恤政》，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28(34)张采：崇祯《太仓州志》卷五《物产》，广陵书社2014年版。

29(35)(4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589、2471页。

30(36)宋雷：《西吴里语》卷四，钦定四库全书本。

31(37)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一二《风土类》，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刻本。

32(41)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六《食货篇下》，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十三年刻本。

33(42)乾隆《吴江县志》卷之十二《田赋》，乾隆十二（1747年）年刻本。

34(43)陈威、顾清等纂修：正德《松江府志》卷五《土产》，齐鲁书社1996年版。

35(44)钱肃乐、张采纂修：崇祯《太仓州志》卷一四、一五，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36(45)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四》。

37(46)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页。

38(47)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页。

39(48)范金民：《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40(49)近年来学界对明代的海禁政策多有反思，厘清了一些长期以来被误读、扭曲的历史，能够理性、客观、具体分析和看待明代的海禁政策。如万明先生认为明代的“海禁”政策是明代政府海洋管理的一种方式，绝非全面禁绝一切中外之间的海洋贸易往来，中外之间的交往渠道是畅通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十分密切；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总体是开放的，明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关键时期，是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早期“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参见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此外曲金良、张开城等也都对明清时期海禁政策作了“正本清源”的辨误，参见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张开城《比较视野中的中华海洋文化》，《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41(50)王在晋：《海防纂要》卷一《福建事宜·海禁》，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本。

42(51)朝贡制度历来是中央政府处理藩属邦国关系的主要制度形式，对于尚未藩属的外国，凡愿向化前来的，也纳入这种制度进行管理。朝贡制度下的“朝贡贸易”，事实上总量相当惊人。参见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等论述。

43(52)(59)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1-133、17页。

44(53)陈东有：《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45(54)《明太祖实录》卷四二，洪武二年五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46(55)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上，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72册。

47(56)(57)徐光启：《海防迂说》，载明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九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版。

48(58)许浮远：《请计处倭酋疏》，载明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四〇〇，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版。

49(60)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51页。

50(61)(63)王在晋：《越镌》卷二十一《通番》，万历二十九年刻本。

51(62)杨循吉纂修：嘉靖《吴邑志》卷一四《物货》，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

52(65)(69)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53(66)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20页。

54(67)李金明：《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55(68)沈定平：《伟大相遇与对等较量——明清之际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1页。

56(71)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农桑广类·木棉》。

57(72)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8-179页。

58(73)霍与瑕：《上潘大巡广州事宜》，载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八，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59(74)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